



# 立足 1 小时通勤圈 推动长三角协同发展

# 首位城市怎样发挥引领作用

#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 需增强多元主体合力

■ 陈宪

近年来,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现阶段,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三个方面的要义,即空间范围、产业生态和协同发展需要有关各方的关注和推进。

**第一,关于空间范围。**  
都市圈的物理空间,是有国际通行的原则的,即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不过,这里的通勤工具,主要是指轨道交通,即地铁和轻轨。都市圈的物理空间,不同于以行政区划界分的空间范围,而具有一定弹性和张力。某个城市(镇)可能在一个都市圈的集聚和辐射范围,也可能同时在另一个都市圈的集聚和辐射范围。例如,江苏省宜兴市和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的空间距离大致相等,可以说同时是这三个都市圈的一部分。

**第二,关于产业生态。**  
唯有创新生态的健康发育,才能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较快发展。产业生态主要包括创新生态、产业体系、产业链和营商环境等要素。其中,产业高端化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是现代化都市圈产业生态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第三,关于协同发展。**  
如果说都市圈产业生态主要是市场主导,那么都市圈协同发展就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协同发展的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规划先导和引领,二是健全体制机制,三是落实具体制度。

在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都市圈规划一方面不断调整原来的不合理设置,另一方面就是将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元素放到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空间,或先行先试,或重组融合,产生增量意义上的动力和价值。  
现在提出的大湾区规划,突破单个城市的行政区划,以打破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与产业规划相比,政府编制区域规划的作用相对正面。政府可以通过区域规划为科创资源和新兴产业的集聚辐射,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人才流动、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具体制度的落地和落实上。要以均衡普惠、整体提升为导向,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高共建共享水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刘江会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有所增大,区域内多个地方性发展规划存在战略趋同现象。比如,多地提出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并在一些重点产业方向上也有重叠。反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它在各层级城市间形成了较为清晰、完善的产业分工格局,几个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也各具特点,实现了错位发展。  
同时,全球化表现出更为复杂和多面性的态势,城市群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空间载体,全球化的竞争从城市竞争转向城市群竞争,依靠单个城市在规模和功能上难以有效应对这种竞争态势。因此,需要“跳出长三角看长三角”,推动三省一市的优势互补、产业共生,促进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世界级巨型城市群。

## 首位城市引领结节成网 助推区域经济抱团发展

长三角要在更高层次上“抱团”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需要上海积极发挥“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的引领作用。  
首位城市的有力引领,是巨型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的共同特征。对照国际上的巨型城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都有一个领袖级的首位城市,表现出超高的网络联系能级。  
在了一项权威的城市等级排行榜中,纽约和伦敦的网络联系能级高居前两位,是最具有“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力和最具有“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造产业链”能力的城市。过去几十年里,纽约和伦敦基于这两大能力将区域内的城市结节成网,推动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竞争。  
与这些顶级全球城市相比,“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功能不足制约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例如,上海虽然拥有数量最多的跨国分支机构,但全球总部级跨国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不像纽约和伦敦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业务遍布全球的总部级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这制约了上海

缺少在市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制约了上海在全球的辐射力、影响力。当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有利于这类企业成长的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它应该是一个由大量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巨擘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形企业生态链,关键要构建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工具

引领长三角企业“在全球布局生产并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当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四大品牌”建设。要引领长三角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竞争,“上海服务”是关键,其中的重点在于提升服务能级。这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提升“上海服务”的层次,尤其是着力提升银行、证券、保险、风险投资、金融科技、管理咨询、会计、信息和广告等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二是提升“上海服务”的网络辐射范围,不仅要提高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能力,而且要提高服务全球的能力。

## 警惕传统金融先发优势 变为科技金融后发劣势

具体来看,上海需做好三个方面文章:  
**一是抓住自贸试验区扩容契机,对标国际金融会计和投资贸易的高阶准则,培育更多能够“为全球服务”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企业。**  
上海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联系能级不足,一个显性因素在于上海没有产生很多业务遍布全球的知名公司。与纽约、伦敦等首位城市相比,上海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货币的可兑换性、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经济体制要素的国际兼容性还不够。同时,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还不够,导致上海在投资与贸易化便利程度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建议抓住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

制度体系,创新涉外风险管理模式,实现在岸金融服务支持境外生产经营经营活动。

**二是借助增设科创板的机遇,营造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孕育能够“在全球制造”的本土型引擎企业。**

缺少在市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也制约了上海在全球的辐射力、影响力,更限制了上海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能力。当前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构建有利于这类企业成长的雨林式企业生态链。它应该是一个由大量初创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和巨擘企业构成的金字塔形企业生态链,关键要构建完善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工具。

上海具有传统金融的优势,但以高度不确定性和“轻资产”为特征的创新企业与传统金融的风险厌恶属性并不匹配。同时,由于业务模式、利润来源和人力资本的路径依赖,使得传统金融发展科技金融业务的动力不足。因此,尤为要警惕传统金融的先发优势变为科技金融的后发劣势。

为此,要进一步巩固传统金融优势地位,力争成为各大商业银行全资理财子公司的注册地和总部所在地。同时,要借助增设科创板的机遇,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创投、科技银行等新金融要素的大力发展,依托主板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的优势,为培育巨擘企业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

**三是构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提升企业“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能力。**

对致力于“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企业而言,它们更为关注城市的腹地支撑、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以及经济体制框架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等。因此,不能完全对照世行的中小型企业标准来优化营商环境。

建议充分整合现有的全球城市和营商环境研究资源,在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构建既能够反映中小企业需要又能满足跨国公司需要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尤其要新增反映腹地支撑、全球链接、国际市场拓展、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基础性经济金融制度与国际市场兼容性等指数。这是上海能否孕育出为全球提供服务、能够在全球缔结产业链的本土型引擎企业的重要条件。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 邱俊鹏 沈开艳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软实力、竞争力和运行效率。在2019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总体排名跃升了32位。上海作为样本城市,权重达55%,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我们还不存在不小差距。有关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调研显示,除了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当好“店小二”之外,也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社会组织是一种制度安排,是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产物。当前,社会组织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行政审批脱钩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程度不够。**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部分需与政府脱钩的社会组织仍习惯于按照传统的行政审批方式开展工作。

**第二,中介评估服务增加企业额外成本。**一些政府部门的监管依然采用“需出具第三方检验报告”的做法,但出具报告的中介机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收费越来越高,且存在行业自律意识不强、服务效率不高、监管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第三,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不足。**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愈大,社会组织承接的职能和权力理应愈多。但不少行业协会缺乏高效的运行制度和有力的管理团队,难以在资质认定、企业评估、行业指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导致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影响力和权威性偏弱。

下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需要着力完善社会组织建设,增强多元主体合力,弥补服务和监管短板。  
**一要切断中介服务与政府部门的利益关联。**可梳理和清理包括各类技术咨询、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在内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推进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破除中介服务行业垄断,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加强中介收费监管。

**二要培育和建立一批有创新活力的中介服务机构。**例如,鼓励国内外知名中介服务机构来申城发展,加大对会计评估、金融服务、产权交易、法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兼并重组的支持力度。

**三要充分吸纳行业协会的诉求。**从政策制定到政策调整,政策实施,都离不开行业协会的协调。因此,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前,应当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为此,可将行业协会纳入产业政策制定的范畴,以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 and 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要增强社会组织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一些人抱怨的“政策一刀切”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政策还不够细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全能型政府”无法充分了解各个行业的信息。有鉴于此,可进一步强调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加强社会组织在监督管理中的作用,政府更应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必须防范“两面人”

# “不请示不报告”会有什么危害

■ 曹东勃

治理“政治上的两面人”,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之后,中央高度重视的又一项政治任务。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

■ 邬思源

日前,《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正式印发,以条例制定出台请示报告制度,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一方面是对党内精神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新时代背景的创新和发展,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

## 并非剥夺下级组织自主权

请示报告制度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一段时间里,无视中央权威的现象一定程度有所蔓延。例如,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推波助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这些现象都与维护中央权威相违背。

我国有着近14亿人口,执政党员数量近9000万,国情复杂,治理难度高,没有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定于一尊的权威是不行的。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党组)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

治国理政战略部署和目标任务的实现。如果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不请示不报告,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

同时,下级向上级特别是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内容,还是上级特别是中央分析研判和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其本身也是调查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民主集中制得以运行的过程。  
就请示而言,下级各级党组织就重要事项向上级请示,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呈报的请示进行归并、整合与研判,并向下级党组织作出指示,就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就报告而言,上级组织对下级呈报的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对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进行宣传,对于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加以吸收、推进和改进,同样也是民主集中的过程。

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并非剥夺下级组织的自主权,而是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地方或下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经过综合各方面意见,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央,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由此可见,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是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

## 对党是否忠诚的重要标尺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党的团结统一,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也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实现了有关党内请示报告事项的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既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也是工作纪律。

现实生活中,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和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好几本港澳通行证,还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而根本没跟组织报告一下。

针对这些问题,有些党组织认为,只要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但事实证明,不少领导干部的违法违规案件就与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进一步来看,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是衡量下级组织及领导干部心中是否有党、对党是否忠诚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其是否具有组织观念的重要标尺。《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的出台,意味着对党的组织、干部与党员管理的开关拧得更紧,有利于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观念,进而使全面从严治党之路更稳、更宽、更实。  
(作者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古代,“举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字”之人就是典型的“两面人”。对于这种看似八面玲珑实则缺乏道德立场的人,中国传统的社会认知和道德评价一直是持有否定和负面评价的。儒家对其有个称呼“乡愿”,意为貌似谨厚,却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孔孟分别批判乡愿之徒为“德之贼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一些党员所表现出的知行脱节、言行不一、知情分离、情意相悖等现象,是一种新的“乡愿”。他们固然是少数,但任由其发展下去,必然由人格障碍转化为政治组织的理想价值迷失。当这些“带病生存”的党员从普通岗位上走上领导岗位后,更易发生蜕化变质,成为具有极大危害性的“两面人”。

治理“政治上的两面人”,既需要始终拧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也需要在制度上坚持好“思想上入党”这个传统;不仅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及“两面人”问题的甄别、筛查、惩戒,而且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理,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谈及提高党员质量和清理“混进党里来的人”时的那句谆谆告诫永远值得铭记:“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 党员干部怎样才能提升政治能力

■ 阚天舒 方彪

政治能力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是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

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新时代,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发挥群团组织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本领。要将政治能力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和战略任务来对待,从政治定力、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本领等方面入手着力探索无产阶级政党政治能力建设的中国路径。

**第一,把握政治定力,坚定理想信念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党在理想追求上一定要保持政治定力,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这就要求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把握政治方向,增强政治鉴别力。**  
政治方向是目标,是纲领,集中反映党的政治主张,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采取什么方针政策的集中表达。只有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切实担负使命、正确履行职责。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迷失,必须增强方向把控的政治鉴别力。较强的政治鉴别力,能使我们在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觉,能使我们牢固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三,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辨别力。**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党的宗旨,党的宗旨体现党的立场。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责、开展工作中,尤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政治方向,注重政治效果,考虑政治影响,确保政治和业务融为一体、高度统一,进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政治立场的选择,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有

没有较强的政治辨别力。增强政治辨别力,就要在现实中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第四,提高政治本领,强化政治执行力。**  
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教育人,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党员干部加强学习,能够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促进工作顺利开展。

同时,党员干部还需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增强政治执行力,才能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做到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务大局。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增强自己在纪律遵循上的政治执行力,才能不断改造和提升自我。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 面向群众创作没档次?

■ 陈志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不管时空怎么转变,文艺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的服务本质没有变。

原因之一:人民需要文艺,文艺也需要人民。人民既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是文艺的源头活水。优秀的文艺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功能,使人们在美的熏陶中接受思想启迪和情感升华。因此,文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同时,人民又是文艺的天然裁判。文艺只有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才能迸发出蓬勃生机和活力。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

原因之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文艺作品要想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必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纷纷涌入延安,使延安成了生机勃勃的文艺圣地,但随之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对当地群众缺乏了解,没有真正体验过战斗生活,写作的中心仍以知识分子为主;二是理论和实践脱节,有些文艺工作者性情比较孤傲,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甚至还带有成名成家、绝对自由的想法,因而无法创作出反映人民真实生活、引发人民共鸣的好作品。

毛泽东同志针对这些问题指出,文艺工作者平时要注重与当地人民保持密切关系,深入当地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才不会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在此情形下,广大作家纷纷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抒发真情实感,涌现出《小二黑结婚》《王贵与兰花》《荷花淀》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工作者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实践证明,文艺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剑走偏锋。无论是裹步不前,还是成为市场的奴隶,都不符合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要以实际行动抵制“三俗”现象,割除模仿和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逐步解决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要以手机、互联网、数字电视等新媒体、自媒体和融媒体为平台,进一步拓宽人民接触优秀文艺作品的渠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作者为上海商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所教授)